

文化记忆

“中国”一词的前世今生



何尊于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的贾村。1965年8月,发现者陈堆因经济拮据,将这件青铜器连同另一些废铜混装在麻袋里,卖给宝鸡市一家废品收购站,总共卖了30元钱。1965年9月,宝鸡市博物馆职工佟太放在收购站看到这件铜器,感觉应该是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,便向馆长吴增昆汇报。吴增昆随即让保管部主

任王永光去查看,王永光赶至废品收购站后,也断定这是一件珍贵文物,便以30元的价格将这尊铜器买回博物馆。

1975年,国家文物局调集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出,由著名青铜器专家、时任上海市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先生负责筹备。该尊成为展品之一。马承源在故宫武英殿见到实物后,反复观察,心中纳闷如此大的器物为什么没有铭文。他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摩挲,感觉底部似乎刻有文字,随即让人送去除锈。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,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长篇铭文。

铜尊内胆底部有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,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,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,而其中“宅兹中国”是“中国”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。这篇铭文把“中国”的最早地址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。

《左传·庄公三十一年》有“凡诸侯有四夷之功,则献于王,王以警于夷。中国则否”的说法,足见春秋前期,“中国”一词就已经与蛮、夷、戎、狄对举。

《公羊传·僖公四年》称:“南夷与北狄交,中国不绝若线。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,卒荆,以此为王者之事也。”齐桓公救援邢、卫等国,被称作“救中国”,足见此时的“中国”,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“诸夏”的国家。

“华夏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,“楚失华夏”。唐孔颖达疏:“华夏为中国也。”“华夏”所指即为中原,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。

华夏族人称其四境民族为蛮、夷、戎、狄,而自称为“中国”。“中国”一词后来随着所指对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。大致说来,有以下六种概念:一是指京师(首都)。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,如诸葛亮对孙权说:“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,不如早与之绝。”三是指中原地区。四是指国内、内地,如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:“天下名山八,而三在蛮夷,五在中国。”五是指诸夏族居住的地区。六是指华夏或汉族建立的国家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经常出现这样的称谓。所以自汉代开始,人们常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“中国”。正因为如此,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,便以“中国”自居,如鲜卑人建立

的北魏自称“中国”,将南朝叫作“夷狄”;而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,仍以“中国”自居,称北朝为“索虏”、北魏为“魏虏”。

“中国”一词所指范围,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。“中国”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,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,从夏、商、周开始直至清末,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“中国”作为正式国名。

“中国”的别名,除上述的“华夏”外,还有“中华”“九州”“四海”“神州”等称呼。“中华”最初指黄河流域一带,《三国志》裴注中最早出现了“中华”一词。随着版图的扩大,凡属中原王朝所管辖的地方统称为“中华”,泛指全国。“九州”之名,起于战国中期。《禹贡》中有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九州。其他古籍也有“九州”的记载,尽管具体的州名有差异,但记载的均为九个。“九州”就成了中国的代称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“中国”正式作为国名,则始于辛亥革命以后。

(选自《寻根》2018年第四期)

文坛走笔

朴素如书

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我更愿意去书店买书,而不是去图书馆借书。那时有一种焦虑,总想追求最新的知识潮流,很多新书到图书馆总会晚上几个月。当然,书店的老板很热情,而图书馆的阿姨总是冷冰冰的,这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人的心情。

毕业很多年,逐渐懂得自己当年的幼稚,图书馆的书相对陈旧,但也有很多经得起时间检验。如果一个人总想追求更新的知识,就会根基不牢,像浮萍一样无依无靠。这样的失误永远没有办法再弥补,走出校门,再到图书馆借书就很难了,更重要的是,网上购书越来越方便,头一天下单,第二天就会送达。

这种便捷的最大坏处,就是减少了期待和惊喜。在学校读书的时候,要穿过校园,再经过一个天桥,才能走到自己喜欢的书店。那时很穷,每次用来买书的钱不过几十上百元,当然是精打细算。一路上,就盘算好了要买哪几本,带着这样的心情买书,来回都是精神享受。

回想起来,在网上买书最愉悦的时刻,是在下单后到见到书之前,科技进步让这个过程大大缩短了。这两天搬家我才发现,有几本书我买回后竟然没有拆

开塑封,我也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会买。朋友说,现在自己买回家的衣服,很多时候都不会马上穿,而是放在那里很久。这就是惊喜的丧失,当我们太容易满足的时候,这种满足的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。

去年夏天,我特别想看理查德·桑内特的《公共人的衰落》,那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好几年前的译本,网上一直没货,书店也找不到,这反而刺激了我的欲望。我想到一位在大学任教的朋友,求他在图书馆里帮我找找,这时候图书馆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,他很快就借了出来。

当天中午我就去取了。在上班的午休时间,乘坐地铁2号线,过了六七个站,从地铁出来,发现气温高得吓人。剩下的一千米,我选择徒步前往,这大概是我这个夏季最热的一天,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天,我就像一个学生一样,对一本书充满了期待。在大门口见到朋友,从他手中接过皱巴巴的书,我有点被自己感动了:在当下,还有谁会冒着中暑的危险,穿越一个城市去取一本书呢?

惊喜还不止于此。我发现这本书有人看过,那位读者用铅笔在上面画线,偶尔还有几行批



语。在学校图书馆的书上写字,是不太文明的行为,但是你会想到,在不同的时空,有人曾和你读过同一本书,这是一种缘分,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交流。

最终,画线和批注都没有延续得太久,100页后书就是干干净净了,她还是读不下去了,而我最终津津有味地读完。这又让我有几分窃喜,仿佛获得了某种独家的知识。

这让我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去书店买书的情景,那时的自己,贫穷、瘦弱、寂寞,但是却有着面对知识世界的雄心。越来越感到,这种艰苦的岁月,不但在当时毫无觉察地开心度过,也最能给人留下记忆。那个时候的自己,也许是美好的,相比之下,现在从快递柜里取一箱书,然后就堆在书房,真的有几分腐朽。

(选自《新华每日电讯》)

学林漫步

带着疑问读历史

张燧是明代的一个作家,说他是历史学家,也不为过。我在读他的《千年百眼》一书时,惊讶于他的独立思考精神,这本书,是他的一部史论随笔集,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,面对史书上很多已成定论的东西,他都不盲从,而是大胆怀疑,客观分析,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。

《史记》这本书被史学研究者奉为圭臬,但张燧在通读《史记》后,却认为《史记》中的部分内容,并不是司马迁的原作,而是后人添加上的,“我又考证了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,说是‘肃宗时期,杨终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十几万字’,那么,可知现在的《史记》不是司马迁的原书,难怪它杂乱不一”。类似这样的观点,他提出来很多,如:“曹操不是复姓”“刘知几没有写史的才能”“秦国的强大不在于孟明”等,都颇有见地,让人深思。

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个带着疑问读史的学者,近读他的《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,发现他对很多史料,都不轻信,而是要亲自考证一番,从而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来。例如,晋代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中,有“晋太元中,武陵人捕鱼为业……自云先世避秦时乱”的字样,因此,历来研究者认为,桃花源的所在地,当在武陵,而先世所避的“秦时战乱”,应为秦朝末年的战乱。

但陈寅恪先生经过考证,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,他认为,“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,而不是南方的武陵”。那么,陶渊明为什么把地点写成武陵呢?陈寅恪先生认为:“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,则因为采用了刘驥之人衡山采药的故事。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,但因牵连混合刘驥之人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,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。”

(选自《工人日报》)